

英 伦 阅 书 记 (下)

李致忠

二、在书史研究中具有特殊价值的敦煌遗书

在大英图书馆东方部所藏的敦煌遗书中，有很多研究价值极高的藏品。敦煌学各个方面的研究人员，甚至中国古代各个领域的人员，几乎都可以在这里找到或多或少的资料。因工作关系，笔者对于中国古代书籍史素有爱好，这次在大英图书馆东方部大饱眼福。特别是关于中国古代书籍装帧形制演变史方面的敦煌资料，引起了我的极大兴趣。在这里，只想以白描的手法做个简单介绍，以期给中国书史研究的同行们提供一些素材。

妙法莲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 （第二十五） 五代写本

粗厚麻纸书写。开本比三十二开小，比六十四开大。绘有边栏界行。上图下文，每叶文与图比例约各占一半。每半叶一图，每半叶文字五、六、七行不等，每行五、六字不等。凡二十一折叶，除首折和末折三面绘图、书字外，其余各折均四面绘图书字。共八十四面，有文字者八十二面。插图七十五幅，且多为彩绘。这件东西大概出自民间，绘画、书字于质拙中又透出天然气息。从纸张、墨色看，我认为是五代时期的作品。大英图书馆东方部吴芳思博士是研究中国古代建筑的，她的博士论文就写的是中国的四合院。她从图中建筑物的形式特点分析，认为是中国十世纪的作品。十世纪与五代基本一致，故这件写本当是五代时期的作品。

这件写本在中国古代书籍史研究中的价值，主要是表现在它的装订形式和插图方式方面。而这两方面，在今天都是属于书籍装帧艺术里边的内容。

这件写本以粗厚麻纸书写。由于纸厚，故四面书字、绘画。每叶写好后便从中间折叠。首叶和末叶均只三面书字，留下一面空白，以便做为前后封面。首叶从折叠叶内面右半面写起，留下折叠叶外面左半部分为空白，当做前封面。末叶从折叠叶外面左半面写起，最后留下折叠叶外面右半部分为空白，当做后封面。而后二十一个折叶依次排好，戳齐右边，在右上角穿孔，以丝线横向绕过书脊锁装。左边书口的上下角均被裁成半圆形。这种装帧形式非但是典型的册叶式，而且是用线装订的。因此，它在中国古书的装帧形制上有重要的研究价值。且从首、末叶各留半叶不书字的情况推测，很可能在书写、绘画这卷经文时就已经考虑到了它的装订办法，否则当不会那样留下空白。因此，这种装订当时已是有意识的作品了。

前边已说过了，在观音、文殊、普贤、地藏四大菩萨中，观音菩萨在中国影响最广，这卷代表观音菩萨神灵的普门佛经，流传也极多。这表明信奉观音菩萨、诵念这卷普门品佛经的人也极普遍。事物就是这样，越是普遍需要就越要考虑它的使用方便。这卷观世音菩萨普门品佛经，之所以采取这种大小的开本和这种装订形式，大概就是为了诵念方便，携带方便。据说，这种小本子的佛经，当时是善男信女们装在衣兜里随时诵念用的。

我国版画起源于雕板印刷的佛经版画。当着佛经采用卷轴装的时候，版画常采取卷首扉画的形式。此可从唐咸通九年(868)王玠雕印的《金刚经》，以及后来雕印的《开宝藏》、《赵城藏》等，都是卷首鏤印扉画的形式得到证明。宋以后雕印的许多单经大藏，装帧形式虽然许多都变成了经折装，但版画仍多取卷首鏤印扉画的传统。唐末五代，虽然出现了不少雕印的单幅佛像版画，且是上

图下文形式，但这些毕竟还是以画为主。真正上图下文的书籍，我知道的当以英馆所藏此件为早，且为连续插图的形式，就更显得珍贵。过去讲中国书籍连续插画，特别是连续插印版画，是起自宋代。今有英馆此件为证，则中国书籍装帧艺术中的插画形式——连续敷演一个故事情节的插画形式，其历史应往前推，至少要推到五代。

金刚般若波罗密经 唐写本

粗厚麻纸书写。似小三十二开本大小，横用竖写。无边栏界行。经文后是大身、随心、心中心三真言。真言后有“西川过家真印本”一行，显系从西川过家印本《金刚经》传抄而来。尾有“时天复五年岁次乙丑三月一日写竟，信心受持，老人八十有三（三疑为二之误）”两行。证明此本《金刚经》写于天复五年上半年。按“天复”，是唐昭宗李晔的年号，本无五年。天复四年（904）已由唐哀帝李柷继位，改元天祐。故天复五年实际已是天祐二年（905）。这个本子仍称天复五年，盖地处偏僻的河西人不知改朝换代，仍用旧的年号所致。

这件写本的价值，不在于其书写的早晚，而在于它是册叶式的线装书。今天虽已见不到其线装的具体情状，但原来用线缝绩的孔眼犹存，凡三眼，表明当年是一本线装书。这一事实表示，早在唐代末期，线装形式的书就已出现。这在中国书籍装帧形制演变史上就有极高的研究价值了。

金刚般若波罗密经 唐写本

粗厚麻纸书写，单叶双面书字。开本大小似现在的三十二开，但为横用。无边栏界行。卷后在大身、随心、心中心三真言前，有“西川过家真印本”文字一行，说明此本亦是从小西川过家的雕印本《金刚经》传抄而来。三真言后有“天祐二年岁次乙丑四月二十三日八十二老人手写此经流传信士”文字两行。天祐二年与上面传抄本的《金刚经》最后落款所题之天复五年实际是同一年。

前者是这一年的三月一日写竟，这一本是四月二十三日写竟，时间只差五十二天。且据同一底本，似又是由同一老翁操笔传抄，看来这位老翁是想广做功德，求登极乐的虔诚佛教信徒。

此件的价值，在我注意的角度还在其特殊的装帧形式上。这件东西的装帧，是以后封面为底，将双面有字的书叶从最末叶起，先行以右边无字空条处粘于封底纸的右边上，其它各叶亦均以右边无字空条处逐叶向左相错粘于头一叶的右边无字空条处，最后粘加上封面。这种装帧形成的外部形态是，右边书脊不齐，而是逐叶向左相错；左边书口也不齐，从正面看，封面伸延最长，掩盖了书口形象。但若是将书翻过来，从底封面看，则底封面缩回最短，其余各叶仍是逐叶向左相错延伸。所以这种装帧书脊，书口两边的形象都状似龙鳞。这种装帧形式究竟叫什么名字，不敢断言。但我个人认为，这种装帧似是对唐代中期出现的旋风装的改进。唐代旋风装，就外观而言，尚未摆脱卷子装的形态。但其内部书叶的装帧，其粘连相错的形式则与此无异。盖唐代旋风装虽在翻检方面改变了卷子装的不便，但外观还是卷子装，仍不能摆脱卷舒的烦琐。为了彻底摆脱卷子装的桎梏，唐末便出现了这种装帧形式。这种装帧只有翻阅之便，而绝无卷舒之劳。使书籍装帧形制，由卷轴装彻底过渡到册叶装。故这件东西在书籍装帧演变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自此再返回去说同年三月一日八十三老翁手抄的那本《金刚经》，其装帧方式是在书叶右上角打孔穿线装订。其意义不但表明唐末就出现了线装书，也表明它大概又是对中国纸书仿梵夹装式的一种改造。中国纸书的仿梵夹装式，是在写好的书叶上部正中打眼，而后用两块木板相夹。两块木板的相应位置也打眼，而后用丝线绳，一头先打上大结，防止提拉时跑出去；一头从底板打眼处相穿，再将书叶逐叶相穿，最后穿过上夹板。阅读时，先翻开上夹板，再依次翻开书叶；收藏时戳齐夹好，再用余出来的穿绳绕捆前后夹板。这种装帧的笨拙可想而知，既不

便翻阅，也不便随身携带。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于是将穿孔外移，移至书叶右边上角，去掉夹板，易以封面，用线穿订。这一改变在现代人的眼里，似乎无足称道。但在一千多年前的古人手上出现，就带有改革和创新的意义。因为它在梵夹装向册叶装的转变上，同样具有划时代的价值。

开蒙要训 五代写本 存三叶六面

粗厚麻纸书写，有上下边栏及界行，每行字数不等。开本较六十四开稍大。卷尾有“显德五年十二月十五日大云寺学郎”一行，表明此本之传抄盖在显德五年。显德是五代后周世宗柴荣的年号，五年即公元九五八年。只存三叶，双面书字，共六面。右边有装订遗孔，装订线已佚。证明此件当时是线装形式。

金刚般若波罗密经 唐写本

粗厚麻纸书写，双面书字。每半叶六、七行不等，每行字数亦不等。无边栏界行。共十六叶，存三十一面，上封面残佚。从最末叶左半叶的背面即做封底看，则首叶右半叶的背面就当是上封面。卷尾题名为《金刚般若波罗密经》下。后有“西川过家真印本”一行。而后“大身真言”、“随心真言”、“心中心真言”。

“心中心真言”右下有“最不可思议”几字。最后有“天祐三年丙寅二月二日八十三老人手自刹血写之”落款一行。天祐三年即李唐王朝复灭的前一年，公元九〇六年，距今刚好是十八个甲子，一〇八〇年。看来这位老人在归西之前抓紧有生之年连续抄写这部西川过家雕印的《金刚经》，其意盖是想多做点功德。

该经为单叶双面书字，而后将每叶从中间折叠，再将各折叠叶依顺序排好，戳齐书脊，最后逐叶彼此粘连。这种装帧办法当是后世蝴蝶装和包背装的先声。所以这位八旬开外的老人，不但手自刹血勤奋写经，表现出他是一位虔诚的佛教信徒；同时他为了使佛经容易携带、方便翻诵，还大胆改进这些佛经的装帧形式，使唐代盛行的卷子装和经折装，转变为册叶式的线装或初期粘背

装。这种装帧虽然粗糙，这位老翁也算不上什么装帧艺术家，但从中国书籍装帧形制演变史上讲，他却不愧是一位装帧艺术的改革家。

大英图书馆东方部还藏一本《金刚般若波罗密经》，亦出自中国敦煌千佛洞，《敦煌遗书总目索引》中的编号为S5450。其在卷尾题名下，亦有“西川真印本”一行。看样子似也出自这位老翁之手，惜无年款，不知抄自何年。这卷《金刚经》的抄写、折叶、装帧方式，与上述一件完全相同。表明唐末这种装帧形式不只有一件出现。

大英图书馆东方部还藏一本《敦煌录》。开本比三十二开小，比六十四开又大。麻纸书写，单叶双面书字，共七叶十四面。首叶背面右半叶为未书字的空白，折叠之后做为上封面。末叶背面左半叶为未书字的空白，折叠之后做为下封面。卷前为唐故河西归义军节度押衙兼右二将头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国子祭酒兼御史中丞上柱国浑邈真赞并序，共五叶。后有带边栏界行的空叶六面。这件《敦煌录》的装帧方法，是将书叶从中间对折，而后将各个对折好的书叶依次排好，以折迹集中的右边为书脊，戳齐，然后逐叶彼此相粘连。这种装帧方法，既不同于包背装，也不是当时的线装。据它的折叶方法和粘连方式看，其基本特点类乎宋代的蝴蝶装。只不过是此件采用较厚的粗麻纸单叶双面书字，对折之后变成四面有字。雕板印刷的书籍是单叶单面印刷，以版心为准字对字折叠，而后逐折彼此于书脊处粘连，就成为蝴蝶装。故宋、元时期流行的蝴蝶装，在唐末五代似乎也可以找到它的源头。

佛说地藏菩萨经 佛说续命经 摩利支天经

麻纸书写，开本类乎现在的六十四开略大。有边栏界行。每半叶四行，行字不等。双面书字，每叶对折。首叶背面右半叶，末叶背面左半叶均不书字，以便折叠后做为前后封面。凡六十四叶，二百五十四面。卷尾有“庚辰年十二月廿七日”一行。每转

一甲子都有庚辰，故难确定其为哪一个庚辰。但观其纸张、墨色、字体风格，该件书写的年代，似不会晚于五代或宋初。因此，这个庚辰或是后梁末帝贞明六年（920），或是北宋太平兴国五年（980）。这件写经的装帧，是将六十四个折叶依次排好，以折叠的一边朝右，戳齐，上下凿四孔，从书内看，似现在的骑马装订式，从书外看，又是横索竖穿，最后系扣结死。这是个典型的线装书。

金刚般若波罗密经 北宋乾德七年（969）何江通写本。

粗麻纸书写，单叶双面书字。书高15.5厘米，宽14厘米，有边栏界行。每半叶六行，行十二、三字不等。卷首是启请，称“若有人诵持《金刚般若波罗密经》，须至心念净口业真言，然后请八金刚、四菩萨名号所在之处常当拥护。”而后是净口业真言。再后是手绘四菩萨像及八金刚像。再下是发愿文。发愿文下才是《金刚经》正文，卷尾有“于时大宋乾德七年己巳岁四月十五日，大乘贤者兼当学禅录，何江通发心敬写大小经三筑子，计九卷。昼夜念诵，一心供养，故记之耳”题记四行。足证此经写于宋初乾德七年。按乾德为宋太祖赵匡胤的第二个年号，只有六年，本无七年。七年己巳已是开宝二年了。盖写经者地处西陲，只知乾德，不知更改，故仍说乾德七年。

此经装帧，亦是将双书字的单叶对折，形成四面有字。凡五十二叶，一百零四面。首叶背面右半叶，末叶背面左半叶均不书字，以为前后封面。前封面居中竖题：“金刚般若波罗密多经”。对折好书叶依次排完，折边朝右，戳齐，做为书脊，而后沿右边上中下等距离凿四个洞，用双股拧好的丝线绳横索竖穿，最后在中孔书背处打系蝴蝶结。迄今虽已历一千余年，装帧宛在，装线犹存，且还相当坚实牢固。这又是一本典型的线装书。

妙法莲华经陀罗尼品第廿六 五代或宋初写本

粗麻纸书写，单叶双面书字。书高14.5厘米，宽11.5厘米。

每半叶六、七行不等。行字不等。字体粗拙。凡二十二叶，四十四面。卷尾有“己丑年七月日生五日就宝恩寺内马神衙观音经写了”题记三行。己丑不知是哪个己丑，但观其风格纸墨，似当是五代后唐明宗李亶天成四年（929）那个己丑，而不大可能是北宋端拱二年（989）那个己丑。更不可能是再下一个己丑。这件佛经的折叶装订，与前边乾德七年何江通写的《金刚经》完全相同。所不同者，只是凿二孔，用二股拧好的丝线绳穿孔横索竖订，然后在书脊正中打系蝴蝶结。此件亦历千有馀年，装帧宛在，订线犹存，也是一本典型的线装书。

其余装线佚失，而装孔犹存者，尚有《杂抄》一本，《禅门经》一本，《十空讚文》一本，足可说明线装书自唐末五代及宋初就已出现了。只不过后世流行的线装书与此订法不同，但就用线装订这一点讲，则是没有什么本质上区别的。所以中国古书用线装订的源头该当到唐五代去找，后世线装书的形式，只不过是这个源头的流变而已。

大悲心真言（卷下） 宋初写本。

粗厚麻纸书写，单叶双面书字。有边栏界行。每半叶六、七行不等，每行字数亦不等。凡二十六叶，五十二面。卷尾有“开宋皇帝口制禧”题记一行，表明这卷佛经大概是写于宋代开国之初。这件东西的装帧，也是将双面书字的书叶对折，再将对折的书叶依次排好，折边朝右，戳齐，沿书脊竖行凿孔五个，然后用线横索竖穿。从书的内部看，类似现代书籍骑马装订式；从外观书脊看，则是五针横索书背，又很象现代平、精装书的索线方式。然后以一张比整个书叶略宽的书纸对折，粘于书背，做为前后封面。这种装法又很类似后世的包背装。这件写本的装帧方法，恐怕不是随意的偶然的巧合之作，很可能是在抄写经叶时就予先设计了。因为此经的首叶背面右半叶，末叶背面的左半叶均未留空叶以做为书册的前后封面。而是以首叶背面右半叶为开端连续书

写，这样就必须另配封面。故用线竖穿横索订牢之后，再另纸粘裹书背并做为书衣。这种装帧方法，虽然与后世的包背装不尽相同，但在包裹书背这一点上，则无甚差异。包背装一般说法是出现于南宋，是针对蝴蝶装翻检不便、容易散裂的缺点而形成的。其折叶方式与此不同，那是由于版印书叶的缘故。其固定书叶方式采用纸捻穿订，与此也不同。所以这件写本还不能就认为是包背装。但包背装的源头似乎也可以找到这里。

唯识三十论要释 可能是唐写本。

麻纸书写，单叶双面书字。有边栏界行。每半叶八行，每行字数不等。凡五十六叶，一百十二面。前封面散佚，故开面便是经文。然底封面只单面书字，未书字的一面便成了封底。由此推知，首叶开面当也是不书字做为上封面。这件写本书叶窄高或说是狭长，类乎后来经折装经叶的宽窄高低。各叶彼此独立，不相粘连。现今是依次排好的一叠，藏于大英图书馆东方部。这件东西为何装帧，不得而知。但从其狭长的书叶看，似乎是仿效印度的贝叶经。且每叶上半部约离上边栏三分之一距离处，均有一圆孔，圆孔边缘似经过穿绳擦磨。因知很可能是仿梵夹装的装帧形式。大英图书馆东方部还珍藏一件《佛经疏释》，书叶与此件相类。有界行而无边栏。界行似非笔绘，好象是原纸隐纹，又像是用硬笔划出来的纹络。每半叶六行，每行字数不等。纸叶中间约离上边三分之一距离处亦有圆孔。麻纸书写。也似唐时写经。这两件写本的装帧极具特点，它很可能就是中国古书中的梵夹装。

梵夹装，本指古印度用梵文将经文书写在贝多树叶上的装帧，而后依次将贝叶经顺好，每叶穿一圆孔，用两块长条形竹板或木板上下相夹，然后用绳穿过板上圆孔，再逐叶穿过每叶圆孔，最后穿过另一板圆孔。绳头打起比圆孔大的疙瘩，以防脱出。阅读时从首逐叶翻阅，穿绳总要擦磨叶孔，故叶孔常有磨痕。收藏时，勒紧一头，再绕过上下两板捆紧。这种装帧由于是两板相夹，

又是梵文书写，故中国人把它称为梵夹装。

这两件写本，用纸书写，但书叶狭长，似仿效贝多树叶；叶中有孔，似仿贝叶经之圆孔；夹板、穿绳未见，但当初似不会没有，没有是无法穿捆的。因此，似乎可以确认，在中国历史上的唐五代时期，似乎也出现过梵夹装的书籍。它与经折装迥异，与后世藏文、蒙文藏经两大板相夹，用带子勒捆，也不完全相同。它们应该都是比较典型的中国古书的梵夹装。

大英图书馆所藏上述若干件唐五代、宋初的写本书，其内容上的价值本文不予论列，单是它们在装帧上的价值也不论自明了。无论经折装、旋风装、蝴蝶装、包背装、梵夹装、线装，都可以从这里寻出源头。尽管此期各种装帧尚不定型，这是开拓时期的必然现象。源头虽是小溪，但流变却从此开始。

作者工作单位：北京图书馆善本特藏部

《灵溪词说》编次成书 示叶嘉莹教授

缪 钺

四载勤劬成此业，今朝重与更增删。
素怀直逼云霄上，真赏长存天地间。
冷暖自知鱼饮水，春秋代序燕常还。
词心共有灵溪境，不羡蓬莱员峤山。

一九八六年六月